

# 通往另一种民族英雄神话 ——以《艳阳天》为中心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吴国如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塑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成为十七年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规约下,复杂暧昧的民间英雄一步步地沦为不情愿的反英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注定要强势崛起,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关照下,这一“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神话的另一再造之途。

**[关键词]**权力话语;民族英雄;反英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0)01-0125-03

考察各民族历史,都有关于英雄的传说。早期关于英雄的传说载体是神话,主要是因为英雄所具有的超出常人的品质往往使他们具有了神的色彩。随着人的意识逐渐觉醒,英雄形象逐渐由神回归到了现实中的人。不仅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草根英雄,也有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都有关于英雄的铺陈演义。传奇的色彩、超人的特质、正义的形象满足了大众对英雄的强烈期待,也是对大众的一种熏陶和示范。对英雄进行叙事,不但表明了一种崇拜之情,同时也是对英雄所代表的意义的一种肯定。英雄是民族的希望,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近世以来,面对饱受屈辱的祖国,许多仁人志士用他们的笔触表达了他们对时代英雄的殷切期盼。提倡最力者莫过于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用充满鼓动性的热情洋溢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英雄作用的极端重视并渴望“非常英雄”的尽早出现:“不有非常人起,横大刀阔斧,以辟榛莽而开新天地,吾恐其终古如长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梦之,吾顶礼祝之。”<sup>[1]</sup>对英雄的焦虑与呼唤一直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塑造了革命英雄形象黄克强,鲁迅和郭沫若分别塑造了启蒙英雄形象狂人和天狗,蒋光慈等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杨直夫(《短裤党》)、李杰和张进德(《咆哮了的土地》)。但由于此时这些知识分子身份的作者缺乏稳定强大成熟的思想理论支撑,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得这些英雄自身脱离大众而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英雄。英雄的传统精英形象由是遭到了解构。

延安文艺运动以来,塑造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英雄形象得到了中共一贯的大力倡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为此定下了基调。他指出:“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并强调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sup>[2]</sup>有人根据当时的形势,据此创作了一些土改小说,但塑造的“新的人物”(“农民英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sup>[3]</sup>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革命英雄形象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出现而产生的。

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演绎新中国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合法性和来之不易以及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切缅怀并以革命的精神教育下一代,为了体现在当时复杂而又充满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人民在筚路蓝缕的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的战斗豪情、乐观自信、希望满怀,为了更加能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团结一致向前建设美好现代民族国家,在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指引下,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作家大力提倡创作革命英雄小说。周扬连续在第一、二、三次文代会上提出了要创造英雄人物的问题。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明确指出:“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sup>[4]</sup>邵荃麟1953年10月4日在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的总结发言《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提出:“我们应该把创作人物形象的问题,特别是创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作为创作上首要的人物提出来。”“无论从政治意义来说,或是从现实意义来说,创作正面的英雄人物不能不是我们目前创作上首要的任务。”<sup>[5]</sup>是否塑造了典型英雄形象是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判断作者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一个重要标准。典型英雄形象必须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先进,道德完美,没有私心杂念,尤其是本领高强,几乎战无不胜,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岁月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具有强烈的卡里斯玛素质。受主流政治话语的规训,塑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成为当时作家们自觉的精神向往和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民间英雄形象进行改造的基础上,一批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以英雄人物的面目开始大量出现。

当然,典型英雄形象的塑造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模塑出来的。没有塑造出英雄形象或塑造出来的英雄形象不完美,是当时赵树理的《三里湾》、曲波的《林海雪原》和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遭到批评甚至是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描写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家笔下,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祝永康(《风雷》)等英雄形象越来越高完美。这些人物的英雄特质来自于在党的领导下高度的政治觉悟、阶级理念所焕发出来的无穷战斗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农村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尽管他们并非是革命战争年代战

[收稿日期]2010-01-21

[作者简介]吴国如(1974-),男,江西新干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场上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他们与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一样,也和敌人斗智斗勇,但由于不再是战争年代,更倾向于斗智。如果说文韬武略具有武的含义,那么武的含义逐渐倾向于前者(文韬),即更追求在与阶级敌人英勇顽强斗争过程中的智力较量。在较量过程中,英雄的高大完美的形象也日渐树立。

## 二

《艳阳天》就是十七年文学不多的以典型英雄形象的意识形态理念为创作依据的典范,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肯定与赞扬。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萧长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所谓龙生龙,凤生凤,阶级出身决定政治立场的阶级论、血统论是十七年尤其是文革的主要阶级论调。一个人能不能够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作者借小说里面进步的富裕中农焦振茂批评反动富农马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儿子马立本的话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理念:“根子不正,还能长出好苗来呀?我就不待见这个小子那副酸相,豆芽子菜,水蓬蓬,竹杆子,节节空,出不了好材料。”《艳阳天》里的英雄叙事就是在这具有先验性质的血统论、阶级论的预设色调中展开。小说开始后不久就写道:“……小时候到邻县打短工,跟舅舅到水棚学织布……”,这间接地说明了萧长春的贫雇农出身,同时也暗示了不但他自己,就是他父亲的这方和母亲的这方都是根红苗正。这就为他英雄形象的塑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除了血缘之父,阶级之父也很重要。能否成为英雄和阶级之父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作者在萧长春的英雄成长路上安排了两个引导者。一是老班长。大公无私、誓死如归的老班长的牺牲及其遗言给了萧长春强烈的震撼。在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长者指引下,出身光荣、根红苗正的萧长春经受了精神的洗礼,实现了灵魂的蜕变,内心充满了为人民服务朴素阶级情感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思想得到了升华。自此,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引领者老班长才是萧长春真正的成长之父——阶级之父。老班长的言传身教,成为萧长春日后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起点和动力。复员后的萧长春用与马之悦截然不同的方式引导村民战胜了饥荒,使他由小小的民兵排长一跃而取替后者成了村里的一把手——支部书记。小说至此初步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地位。土地分红问题沟北人的反应令他倍感困惑。经过区委书记王国忠这位英明长者的再次指引,萧长春恍然大悟。在以后的斗争中,他祭起阶级斗争的武器,团结中农,领导并依靠贫雇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粉碎了反动分子的变天阴谋,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秩序赋予能力,英雄的光环越来越多地闪耀在他的四周,他的英雄形象由是塑造成形。

应该说,对萧长春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对昨日英雄、党内异己分子马之悦的反英雄叙事分不开。马之悦是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这位东山坞曾经的英雄、曾经的党支部书记伴随着萧长春的强势崛起逐渐褪去了英雄的光环,最后被叙事为一个完全站在人民反面的人物、党内的异己分子。乱世背景将处世圆滑、八面玲珑的马之悦推倒了风口浪尖。马之悦凭着过人的机智、勇敢的胆识和求生的本能,在战争年代顽强地周旋于日军、共军、封建地主三股势力之间。在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背后布满了恐惧与惊险。他最终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保全全村人安然度过了乱世,由此也就成就了他在众人人心中的英雄地位。对权力、地位、名誉的留恋使他最初醉心于个人发家“创业”,偶然的机遇却使他成了大家的救世主、心目中的英雄。如果说他前期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并无是非意

识与阶级意识,那么在他送伤员进山经过政委和区长的谈话,他还是有这种意识的。他觉得“政委和区长的话,句句在理,为外国人卖命,屠杀中国人,的确是可耻的事情。”由此,他一路走来。无论是抗日,还是土改,抑或搞农业合作化,他都身先士卒,“从不叫苦喊屈”,凭着本事打拼,最后成了东山坞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时候,他对党切切实实地充满感激之情,拼了命地工作。纵观马之悦的前期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的确没什么实质性的坏事。也许,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什么投机分子,倒是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把他看成一个英雄,一个成长中的民间草根英雄,至少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尽管如此,尽管马之悦一时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权威”,但是他的阶级出身,他生父身份(富农)以及无父(阶级之父)的引导决定了他必然最后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穷人的身份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他富农的出身。对灾荒所采取的不符上级领导意图的处理方式让他黯然退居权力的边缘。权力的剥夺,政治光环的褪色必然引起对荣誉、地位、尊严极度敏感的马之悦内心极为复杂的情感反应。小说对他失势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刻画得生动逼真。如乡党委书记王国忠到东山坞安排秋收工作时对他说的一句话(“正好,党支部、团支书,还有一个副主任,都在这儿,咱们先就便研究研究。”)引起了他极大的情绪反应,他觉得自己有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被抛弃感:“党、团支书,最后提到他马之悦,把马之悦放到最后边了,连个黄毛丫头都不如了。”“虽然自己也在共产党的花名册上挂了这些年的名字,虽然也掌握过东山坞的印把子,真正给共产党效力过,也自认为是一个有资格、有历史的老干部,但是,这全是假的,全是自作多情,人家谁也没有把马之悦当成他们的人,自己也没有把自己放在他们中间;这个天下,自然不是马之悦的,自己是寄人篱下,是俘虏,是囚徒……天昏地暗,他好像发觉自己的躯体在萎缩,变小,从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汉,变成一个渺小的小人物了。”他觉得万念俱灰:“人世问不过是这样乱七八糟。不过是你讹我诈,你争我夺,争夺一遭儿,全是空的。胜利者是空的,失败者也是空的,毫无价值。”深深的失落感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民间英雄,一个长期以功臣自居者的复杂心态。小说据此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多重心理人格的立体的人。这种形象在小说的第一卷里刻画得尤为逼真。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神而存在。但是,这种失落感只是暂时的。好斗的本能、强烈的尊严意识和对权力的迷恋又使他振作起来。巨大的失落感促使他想方设法讨回昔日的荣耀,维护一个强人所具有的尊严。同时,马之悦是聪明的。在和萧长春的较量中,他只是在幕后策划、指挥,对萧长春阳奉阴违,表现出了圆滑和明智的一面。但强大的阶级话语最后让他和萧长春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产生直接公开的阶级对抗,成了党内的异己分子,人民的愚蠢的阶级敌人。在抢粮、抢牲口、退社过程中,以前八面玲珑、遇事有大将风度的马之悦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心急败坏、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利欲熏心的反动分子,一个异化的存在。很难想像在对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形势下,马之悦还敢对着蛮干。以前的谨小慎微的马之悦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马之悦的性格前后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分裂,形象不再统一。不过,在这形象错位、分裂的背后,还是可以感觉的一个处境惊涛骇浪之中的小人物生存的艰难,触摸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性。其实,在阶级论、血统论的观照下,马之悦就是能力再大,以前有过怎样的功劳,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沦落为党内异己分子需要被清除的宿命。一个堂堂支部书记居然彻底沦落成了阶级的敌人,英雄不在,成了反英雄。

当然,对萧长春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并非仅此方面,让他经受婚姻挫折、异性诱惑的考验也是一方面。十七年文学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政治上反动,道德上必然堕落。如何对待两性关系(包括对配偶的态度、异性的诱惑),能否经受得住两性关系的考验,是小说人物能否成为正面人物甚至是英雄人物的关键。“十七年”是一个树立政治权威、新社会规范、新人伦秩序、新生产关系的年代,这需要新政策的推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革新,也需要具有巨大稳定性的道德力量协助完成。“为了维持社会的凝聚力,重整支离破碎的世道”,“英雄形象塑造的道德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sup>[6]</sup>十七年小说的主要人物在他们事业成功以前都要经受婚姻的不幸。《三里湾》里的王玉生和《山乡巨变》里的刘雨生小说开头就离了婚,这几位对自己的前妻并无太多的留恋。《风雷》里的祝永康连老婆都没有。《创业史》里梁生宝的老婆早早就离世。萧长春更加不幸,不但老婆早早没了,还有上老、下有小,负担更重。如何处理男女关系、婚姻关系成了凸显人物道德品质的主要手段。道德上堕落,政治上必然反动,英雄也就成了反英雄,成了人民的敌人。有趣的是,为了强化这种英雄反英雄叙述,小说让萧长春与马之悦两个支部书记的老婆都过早死去。在对待前妻的问题上,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包办婚姻,萧长春尽管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朴素的阶级情感,使他对自己穷苦出身的老婆充满了同情,最终还是接受了她。她的死让萧长春充满了无限的歉疚与怀念。他将这种情感化作爱情,用在儿子小石头身上。面对孙桂英的勾引,他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并站在阶级的立场对她进行规劝,把她转变成了一个具有集体意识、阶级观念的劳动积极分子。除此之外,萧长春们时刻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能够和广大贫雇农同甘共苦。坚定的阶级立场,共产党员的高大光辉形象最终牢牢地俘获了姑娘焦淑红的芳心。对于萧长春,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存在。他的情感并非没有,但这是作为阶级情感存在的。即使小说中有轻微的个人情感流露,也旋即被强大的阶级斗争话语所淹没。如小说第27章写到在夏季的夜晚,萧长春护送焦淑红回家路上两人发生的一场有趣的对话。充满政治意味的话语完全是两人情爱交流的隐喻。在焦淑红走后,萧长春带着意犹未尽的怅惘呆呆地站在原地,“两眼愣愣地望着焦淑红走去的身影渐渐地隐藏在银灰色的夜幕里。他的心反而越跳越厉害了。许久,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也没有办法把刚才突然涌到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仔细地理一理……”这是关于他个人情感表露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关于他个人情感表露的文字。他的出场始终是作为阶级的代言人身份出现的。而马之悦恰恰相反。与萧长

春的有情有义截然不同,小说将马之悦描绘为充满兽欲的冷血动物。他禁不住地主马小辫的侄女马凤兰肉欲的诱惑,凭借手中的权势和她经常苟合,最终将有恩于他的发妻逼疯致死,内心却无丝毫内疚。他甚至深夜跑到孙桂英家妄图将她强奸,哪知偷鸡不成蚀把米,反遭自己人痛打。小说还写到他缺乏成人之美。出于一己私利,拼命为焦淑红做媒,妄图通过外嫁焦淑红拆散她和萧长春这对有情人的同时,削弱萧长春的政治力量。政治上反动的人,除了道德上堕落以外,还追求生活的享乐。不仅禁不住色诱,马之悦还经常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以此来拉拢腐蚀干部。昔日的英雄形象至此已被完全颠覆,以后的抢粮、拉牲口等等一切反动行为则完全是此逻辑的自然延伸。权力话语成就了萧长春英雄的地位、神的形象,同时也宣告了曾经的“英雄”、“权威”——马之悦时代的谢幕。

总之,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使十七年文学革命话语占据了绝对主流地位,人性话语、审美意识、民间文化形态退居边缘被改造或消失。在此惯性叙述之下,人物也就逐步单向度化了,无产阶级政治英雄的出场也就意味着以往具有复杂阐释内涵和审美意蕴的民间英雄的退场。就此而言,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关照下,十七年文学革命英雄叙事这一“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sup>[7]</sup>,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神话的另一再造之途,不断塑造着越来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这些满载卡里斯玛质素的英雄在各条战线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建构在一个新的时代思想制高点上,实现了对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征,民族的形式被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成为十七年文学自觉的典型审美意识和认知范式。

#### [参考文献]

- [1]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玛典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1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版. 818
- [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7
- [5]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1-92
- [6]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6
- [7][美国]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64

[责任编辑:王云江]

## Leading to another kind of national hero myth on characte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novel from 1949 to 1966

WU Guo - ru

(College of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ists run after molding socialist revolution heroic images in their novels from 1949 to 1966. affected by the powerful ideology, the complex ambiguous folk hero reduced to the reluctant anti-hero, and the 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hero doomed to a strong rise. Under the care of construction modern nation-state, the narrative presentation with its own discourse type opened another way of rebuilding hero myth in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Key words:** power discourse; national hero; anti-hero

